



本书系研究经济发展与民主长期命运关系的比较政治经济学巨著

资本主义发展与民主

Capitalist Development and Democracy

[美]迪特里希·瑞彻迈耶 (Dietrich Rueschemeyer)

[美]艾芙琳·胡贝尔·史蒂芬斯 (Evelyne Huber Stephens)

[美]约翰·D·史蒂芬斯 (John D. Stephens) 著

方 卿 译

资本主义发展与民主

Capitalist Development and Democracy

[美]迪特里希·瑞彻迈耶 (Dietrich Rueschemeyer)

[美]艾芙琳·胡贝尔·史蒂芬斯 (Evelyn Huber Stephens)

[美]约翰·D·史蒂芬斯 (John D. Stephens) 著

方 卿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资本主义发展与民主/[美]瑞彻迈耶(Rueschemeyer, D.), [美]史蒂芬斯(Stephens, E. H.), [美]史蒂芬斯(Stephens, J. D.)著;方卿译.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6. 6
(复旦政治学译丛)

书名原文: Capitalist Development and Democracy
ISBN 978-7-309-12317-3

I. 资… II. ①瑞…②史…③史…④方… III. 资本主义-民主-研究 IV. D033.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106842号

Licensed by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Chicago, Illinois, U. S. A.
© 1992 by Dietrich Rueschemeyer, Evelyne Huber Stephens, and John D. Stephens.
All rights reserved.
© 2016 by Fudan University Press Co., Ltd.

上海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 09-2011-050 号

资本主义发展与民主

[美]迪特里希·瑞彻迈耶(Dietrich Rueschemeyer)
[美]艾芙琳·胡贝尔·史蒂芬斯(Evelyne Huber Stephens) 著
[美]约翰·D·史蒂芬斯(John D. Stephens)
方卿 译
责任编辑/孙程姣

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上海市国权路579号 邮编:200433
网址: 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门市零售:86-21-65642857 团体订购:86-21-65118853
外埠邮购:86-21-65109143
常熟市华顺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890 × 1240 1/32 印张 14 字数 346 千
2016年6月第1版第1次印刷

ISBN 978-7-309-12317-3/D · 822
定价: 45.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复旦政治学译丛》编委会

林尚立	陈明明	牛铭实
Richard Lachmann	王元	
陈周旺	何俊志	刘春荣

《复旦政治学译丛》总序

1979年邓小平同志提出政治学研究要“补课”，随后北京大学、复旦大学等高校陆续恢复政治学专业，从那时算起，中国政治学已经称得上“三十而立”，这意味着中国政治学正臻于成熟。

恢复学科之初，借鉴和参考当代世界政治研究中已有的优秀理论成果，成为中国政治学发展的重要路径之一。20世纪80年代末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着手推动当代西方政治学的译介工作，出版翻译了一批重要的当代西方政治学译著，其中包括阿尔蒙德的《比较政治学》、亨廷顿的《变动社会的政治秩序》、罗伯特·达尔的《现代政治分析》、林德布洛姆的《决策过程》等，这些译著打开了中国政治学的视界，使中国的政治学讲师、学生乃至普通读者第一次系统而直接地接触到当代西方政治科学最具代表性的著作。从那个年代成长起来的一批政治学人，如今已经成为中国政治学的中坚，当年他们的学术研究在很大程度上都曾受惠于这些作品。可以说，在中国政治学的发展历程中，这一倾注了众多政治学人心血的翻译工程功不可没。

时至今日，中国政治学已经取得了长足进步，国内外政治学的交流十分频密，相当一部分政治学学者已经直接运用外文文献来进行研究，在顶尖外文期刊上发表论文。但这并不能抹杀译介工作的重要性。须知外文文献获取难度大、代价高，加上阅读起来耗时费力而每每不甚了然，即使对于外语十分了得的研究者而言也未尝不

是如此,长此以往,颇不利于政治学基础理论训练。现实情况是,除非某些狭隘专业领域的文献不得已求助于外文资料,国内大部分研究者尤其是青年学生,还是习惯于通过母语来了解政治学的一般理论知识,更不用说非专业的读者。经由专业政治学者翻译的国外政治学著作,仍然是重要的理论敲门砖,是引领年轻学子进入政治学殿堂的捷径。

实际上,当前问题之症结不在于译介工作是否吃力不讨好,而在于它跟不上中国政治学发展的步伐,无法充分满足读者的需求。自从前述译丛出版之后,由于各种原因,国外政治学的译介工作始终处于断续、零星、时而停滞的状态,某些译著的重要性也一时难辨,致使鱼龙混杂、良莠不齐的现象出现。最近几年情况虽有所改观,但并不能掩盖政治学译介工作总体上的滞后局面。长远说来,政治学后备研究人才的培养,亦会受到这一现状之掣肘。

基于这样一种考虑,我们决心重拾前辈学者的努力,站在今天世界政治学发展的地平线上,重新开发一套国外政治学的经典译丛。这一想法得到了复旦大学出版社的鼎力支持。在出版社的帮助下,从联系版权到着手翻译,我们的工作进度可以用时不我待来形容。译丛定名为《复旦政治学译丛》,希望它能体现复旦大学政治学对于世界政治学前沿的理解和把握。

《复旦政治学译丛》书目的选择可谓不拘一格。我们不受制于某一题材领域、某一作者群,也不受制于作品出版年代的久远与否。因此,丛书中既有如古德诺《政治与行政》这样的经典,也有最新的、来自其他学科领域学者的政治研究。书目筛选的唯一标准就是其学术水准、影响力。读者诸君将通过本译丛接触到一些原先在国内并不知名的作者的作品,而事实上这些作者在政治学界早已经扬名立万,他们的研究绝对是有分量、值得期待和深入探讨的。惟其如此,我们才能真正做到兼容并蓄,译著方可见其效。为了选取最具

代表性的著作,我们征询了多位国内外著名政治学者,听取他们的推荐建议。最终入选者,都经由多位学者同时推荐,再经我们反复阅读,了解其重要性和可读性之后,才确定列入译丛。

我们认为,尽管中国政治学三十年来获得了巨大发展,但是,放宽中国政治学的国际视野,提升与世界最前沿政治学研究对话的水平,仍然是中国政治学的当务之急。希望我们的努力能够为之添砖加瓦。

是为序。

《复旦政治学译丛》编委会

2011年10月25日

序 言

本书的社会起源在于三名合著者 1978 年到 1985 年这七年间亲密的校内和社会互动,他们当时都住在罗得岛。直接促成本书的,则是 1984 年迪特里希·瑞彻迈耶在布朗大学发展比较研究中心一交流研讨会上的发言。他阐述了形成本书核心假设的如下论题:跨国定量研究所发现的经济发展与民主正相关在根本上是正确的,但其正确性并非基于这些研究所给出的原因。相反,工业化是通过赋予从属阶级(subordinate class)以权力,并使得从政治上将其排斥在外成为难题而促成社会转型的。见上述观点与其现代欧洲政治发展的研究有着紧密联系,约翰·史蒂芬斯即在研讨会闭幕时建议两人与艾芙琳·胡贝尔·史蒂芬斯合作著书,进行深入探索该命题的比较历史研究。我们三人都在以往的研究和年复一年的教学中尽力解决民主和专制的社会起源问题,并断定本领域现有的理论和研究,尽管数量颇丰,但在一定程度上是有缺陷的。

从 20 世纪 70 年代初开始,迪特里希·瑞彻迈耶一直在教一个研讨班,该研讨班通过比较跨国定量研究日渐丰富的成果和与之有着很大差异的比较历史研究这一传统,来确定发展对宪政形式的影响。该研讨班起源于关于发展的若干初期课程,以及他和罗伯特·希尔(Robert Hill)、肯·博伦(Ken Bollen)两位研究生的著述。这两位研究生都在展开关于发展和民主的研究。对两大传统——其中一个对拉丁美洲的民主形成了相当乐观的预测——加以系统化概括的第一个正式论述是他撰于 20 世纪 70 年代末、提交给彼得·海因茨(Peter Heintz)纪念文集的论文。

在拉丁美洲政治的研究和教学中,艾芙琳·胡贝尔·史蒂芬斯在长时期内反复发现民主的弱点,以及严酷的威权主义形式在该地区的泛滥。受依附论和奥唐奈(O'Donnell)关于依附论可准确适用于处在工业化较高阶段的拉丁美洲国家(在这些国家,最严酷的威权主义政体出现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正确观察的影响,她发现把民主的成长与早期工业化国家的一系列特定历史条件联系起来的观点更有说服力。因不满意于该观点的政治寓意,她对瑞彻迈耶的命题产生了兴趣,尽管一开始还有所怀疑。她明确希望继续探索这一问题,而欲形成对发展与民主间关系以及早发与后发国家间区别的更佳理论认识,大规模且系统的比较分析是最有前途的方法。

在布朗大学,约翰·史蒂芬斯教授一门关于民主政权崩溃的课程,该课程源于约10年前与胡安·林茨(Juan Linz)一起主持的关于同一主题的研究生研讨班。在该课程中,他指定学生阅读巴林顿·摩尔(Barrington Moore)对于专制起源的结构历史式解释和林茨、斯捷潘(Linz-Stepan)的著作,该书对导致民主败亡的事件提出了更为过程导向的解释。

世事弄人。在我们决定撰写本书不久之后,艾芙琳·胡贝尔·史蒂芬斯和约翰·史蒂芬斯就离开了罗得岛。全书写作之时,三名作者相隔半个大陆,有时还分处不同大陆。这产生了大量会商电话、空中旅行,以及像马德里和瑞士的伦策海德(Lenzerheide)这类不同寻常的会议地点。在这些紧张的讨论中,我们仔细检查了每一段落,谈论了不同的观点,直至达成共识并感到这是一部彻底合著的作品为止,尽管事实上大多数章节由合著者中的一人或两人负首责。本书第一、二、三章由瑞彻迈耶拟就,第四章由约翰·史蒂芬斯起草,第五章的草拟者为艾芙琳·胡贝尔·史蒂芬斯,第六章则是艾芙琳·胡贝尔·史蒂芬斯和约翰·史蒂芬斯。我们共同起草了结论一章。

我们要特别感谢下述人士对各章稿本的评点: Ronald Aminzade,

Jesse Biddle, Valerie Bunce, Daniel Chomsky, James Cronin, Johan DeDeken, Leo Despres, Gøsta Esping-Anderson, Roger Friedland, Manuel Antonio Garretón, Daniel Garst, Jack Goldstone, Jeff Goodwin, Peter Hall, Peter Katzenstein, Prema Kurien, Antonia Maioni, Jane Mansbridge, Pierre Martin, Philip McMichael, Guillermo O'Donnell, Benjamin Page, Charles Ragin, Frank Safford, Michael Shalev, Arthur Stinchcombe, and Samuel Valenzuela。迈克尔·曼(Michael Mann)十分好心,通读了原稿的全部草稿并对之做出了点评。非常感谢彼得·埃文斯(Peter Evans)详细阅读了原稿的一系列草稿并对之做出评论。第二、三章是瑞彻迈耶于1987年到1988年任柏林高级研究院(Institute of Advanced Study Berlin)研究员期间草拟的,他对该院的款待及该院研究员鼓舞人心的友谊表示深深的感谢。第四、五章涉及的大量研究是艾芙琳·胡贝尔·史蒂芬斯和约翰·史蒂芬斯在圣玛利亚大学凯洛格学院(Kellogg Institute,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任研究员期间完成的,他们对该学院的支持表示感谢。

第二章的一个改写本曾收入查尔斯·拉金(Charles Ragin)主编的《比较方法论的问题与替代选择》(*Issues and Alternatives in Comparative Methodology*),该书为《国际比较社会学》的一期特刊[*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parative Sociology*, 32(1/2), © 1991 by E. J. Brill]。第四章的一部分曾收入《美国社会学》杂志[*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4(5), © 1989 by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第五章的一部分曾收入《政治与社会》杂志[*Politics and Society*, 17(3), © by Butterworth Publishers]。我们感谢出版商允许它们在此重印。

我们将本书献给以下三位政治思想家,他们以极具个性的方式影响了我们自身的政治发展。他们都以自身的方式捍卫形式民主,为形式民主而战,认为形式民主本身就是一种价值。另一方面,他们都懂得,民主不会止步于工厂或办公室门前;深入推进民主并使

之更为真实,需要经济和社会不平等的减少,这一点影响深远。

献给表里如一的民主斗士 艾德·布罗德本特

瓦尔特·德克斯

迈克尔·哈灵顿*

* 艾德·布罗德本特(Ed Broadbent),加拿大政治家、政治学家,全名为约翰·爱德华·布罗德本特(John Edward Broadbent),艾德系昵称。布罗德本特于1936年3月生于安大略省,1959年毕业于多伦多大学圣三一学院,专业为哲学,1965年在多伦多大学获得政治学博士学位。1968年大选中,此前在大学任教授的布罗德本特首次入选加拿大大众议院,后连选连任直至1988年。1975年至1989年任加拿大新民主党(New Democratic Party)党首。1988年11月辞去议员职务,改任加拿大议会新成立的国际人权与民主发展中心(International Centre for Human Rights and Democratic Development)主任,直至1996年。2004年曾重新加入选战,并顺利当选众议员,但未追求连任。现为加拿大女王大学政策研究院(School of Policy Studies at Queen's University)研究员。

瓦尔特·德克斯(Walter Dirks),德国出版家、作家和记者。生于1901年1月,1991年5月辞世。1924年开始其记者生涯,先后任职于报社、杂志社、出版社和电台。二战后积极参加政治活动,发表政治评论,并参与教育政策的制定,被誉为“社会良心的扬声器”。政治上反对纳粹主义,主张融合基督教与社会主义,1953—1956年曾任职于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

迈克尔·哈灵顿(Michael Harrington),美国政治活动家、政治学家,1928年2月生于密苏里州,1989年7月辞世。先后就读于圣十字学院(College of the Holy Cross)、芝加哥大学和耶鲁法学院。一生经历颇丰,曾为编辑、作家、电台评论员。长期担任各类社会主义组织的领导人,系美国民主社会党(Democratic Socialists of America)创始人,曾被认为是美国最著名的社会主义者。1972年开始任王后学院(Queens College)政治学教授,留下了大量著述。——译者注

目 录

序 言	1
第一章 导论：资本主义发展与民主的问题	1
第二章 资本主义发展与民主：方法论之争	15
发展与民主间关系的比较历史和跨国定量研究 / 15	
方法论方面的反思 / 36	
第三章 资本主义发展与民主：理论框架	54
民主及其与社会不平等的关系 / 54	
阶级结构、阶级和阶级组织 / 70	
国家机构和民主 / 86	
民主与跨国权力结构 / 94	
以新框架对民主进行比较研究 / 102	
第四章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	108
关于发达资本主义民主国家历程的不同观点 / 109	
欧洲向民主转型：民主案例 / 113	
转型与崩溃：威权主义的案例 / 134	
英国定居殖民地的民主发展 / 164	
结论与讨论 / 189	
第五章 拉丁美洲国家	207
论点 / 211	
初次民主化的条件 / 226	

初步民主化之后的政权转型 / 270	
政权转型与跨国权力结构 / 291	
结论 / 295	
第六章 中美洲和加勒比地区	299
加勒比地区与中美洲案例的比较 / 303	
结论 / 344	
第七章 结论与思考	356
理论评估 / 356	
思考 / 385	
附录：政体分类	399
参考文献	408

第一章 导论：资本主义发展与民主的问题

本书考察了资本主义与民主的关系，或更准确地说，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带来的社会转型与民主统治形式长期命运的关系。我们将审视已有的研究，提出新的理论框架，这个新框架能够对以往研究成果中显而易见的矛盾做出解释，并用三组广泛的历史比较来检验该框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拉丁美洲国家^①以及中美洲国家和加勒比岛国。

资本主义与民主携手并进是一个获得广泛认可的看法。的确，在西方政治话语中，这可谓老生常谈。报章评论和政治公告经常强调资本主义发展，即相互竞争中由资本利益所驱动的经济的发展，也会带来政治自由和对政府事务的民主参与。事实上，民主和资本主义经常被视为几近一回事。

东西方对峙使这一命题获得巨大的自信。东欧国家社会主义政权的垮台，被很多人当作最终证明而弹冠相庆。讽刺的是，一个极为相似的命题在列宁的观念中也占据了中心位置，尽管他对这个命题给出了极为不同的见解。在他看来，“资产阶级民主”是与资本主义经济秩序完美相符的宪政形式。但在这一看法中，资本主义与民主携手并进的原因在于，民主尽管以多数人的统治为名，事实上却保护着资本所有者的利益。无论在概念和对民主的评价上有何区别，这两种看法持有相同的重要主张：资本和劳动市场不受限制的运转构成了民主的物质基础。民主是资本主义的特有政治形式。

19 世纪政治理论的经典著作也倾向于“资本主义发展导致的

^① 本书拉丁美洲国家，指南美洲国家和墨西哥，参见第 207 页注①。——译者注

1 转型将带来民主”的看法。然而,对于这一前景的反应,上述经典与人们从其 20 世纪继承者的思想中所了解到的,有着极大的不同。阿列克西·德·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和约翰·斯图亚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对出现成熟的民主并不看好,而并非只有他们持这一看法。他们对“假民主”(密尔)和“多数人的暴政”(托克维尔)的担心,表达了同时代大量自由主义者和资产阶级保守派的预期。与之相对照,在政治光谱的左侧,马克思选择了完全民主(full democracy),并把普选权看作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后迈出的一大步。

这些反应给我们留下了如下的第一印象,即资本主义与民主的关系问题,比当前习以为常的看法所带来的要复杂得多。事实上,20 世纪业已使这一印象较之 19 世纪已存在时更为清晰。我们的世纪提供了大量繁荣但无民主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体的例子;很多经济体事实上是由严酷的威权主义政权在统治。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韩国、中国台湾地区,和最近数十年中的巴西、智利这类拉丁美洲国家,都是人们想得到的例证。甚至两次世界大战间隔期内的纳粹德国,和各不相同的欧洲法西斯政权都是这一名单的一部分。另一方面,我们已知的几乎所有成熟民主政体,都与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体相联系,且几乎都是 20 世纪的产物。如果说这是一个政体压制性比历史上任何已知者都要严重得多的世纪,它同样又是一个民主政体的世纪。

谈到资本主义发展与民主,对历史的匆匆回顾,就可以提供某些指出两者间联系的一般原理,尽管它们未能解决其问题。就农业社会而言,当其尚未被商业市场关系和工业化渗透,或处于渗透的发端阶段时,它拥有或维系一个民主政府的可能性极低。在农业社会,无论是构成大多数有记录的历史的农业社会,还是今天欠发达国家中见到的、依然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农业来维系自身的农业社会,民主政体,无论其定义为何,都极其少见。古希腊的民主政体,雅典为其中最著名者,充其量不过是欧洲前资本主义历史中的一个

罕见的例外^①。无论我们是否接受其(还有其他一些案例)为真正的例外,农业社会的典型统治形式是且一直是独裁政体和寡头政体。

针对上述看法,有人肯定会马上接道,与现代国家的权力和能力相比,历史上的农业社会的政府皆属柔弱无能。的确,历史上最具暴政特点的政权也不具备形塑社会和促成社会转型的能力,而具备这种能力,即便对当今的民主政权来说,都被视为理所应当。上述能力成了国家能力的组成部分,其加入恰好解释了下述事实,即我们的世纪同时也是极权主义和极具压迫性的威权主义统治的世纪。

资本主义发展与民主的关系并不仅仅是政治论争和政治哲学沉思的对象。几十年来,这一关系也成了社会学、政治科学和历史学加以细致且系统的经验研究的主题。正是这些研究构成了我们工作的根基。

2

事实上,对民主政体的经验研究一直是二战后社会科学的重要关注点之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纳粹德国战败,斯大林的统治征服了东欧,几乎所有前殖民地都变成了独立的“新国家”,社会科学研究者花费了相当大的精力来辨识使民主成为可能和前景的条件。此后,南美洲较发达国家中威权主义政体的兴起,又激起了新一波研究(可参见 O'Donnell 1973 和 Collier 1979)。最近,民主政体在西班牙、葡萄牙和希腊这类国家的回归,以及拉丁美洲民主化的进展,又给这些研究提供了新的推动力(可参见 O'Donnell, Schmitter

① 尽管这些民主政权乃是有着发达手工业和商业的城邦,它们仍十分依赖农业。然而,尽管雅典的自治制度对西方思考民主的传统有其典范意义,事实上它不过是一种受到严格限制的民主政体的形式。这是因为,它把绝大多数的成年人——奴隶、女性和其祖先不属于雅典既有公民的自由人,都排除在了参与者之外。

1848 年之后的瑞士各州,以及 19 世纪的挪威和美国的类似案例,是农业社会极不适合民主政体生长这一法则可能存在例外的更佳备选。第四章将对这些案例加以探讨,它们可引导我们认清能对农业条件下民主政体并不多见这一事实做出真正解释的因素。阻碍民主的最有可能的因素,并非对农业产出本身的支配,而是与支配农业产出频频联系在一起的财富的集中。

and Whitehead 1986)。

这几十年的研究成果在很多方面都令人钦佩。我们可以自信自己胜过了相当多老生常谈的观点,这些观点展示了关于民主政体及其命运的大多数公众讨论。然而,这几近两个世代的研究结果均非定论。其中,有关资本主义发展对于民主政体的命运产生的影响,尤其存在争议。

两个各具特色的研究传统得出了相当不同、同时也彼此无法调和的结果。它们运用了具有极大区别的研究策略和方法,其区别之大,使得两个阵营的学者常常很少关注另一方的工作。对很多国家的跨国定量比较,不断发现发展与民主间存在着正相关关系。因此,跨国定量比较研究对民主政体的命运,无论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还是今天的发展中国家民主政体的命运,都得出了相对乐观的结论。与之相对照,强调对复杂结果加以定性检验的比较历史研究,则倾向于把民主政体的兴起溯源至早期资本主义对之有利的历史条件背景。因是之故,就如今的发展中国家而言,比较历史研究的结论要悲观得多。

两大研究传统相互对立的结论,恰恰是其不同研究模式导致的一道难题。鉴于方法论截然不同,通过什么样的标准才能评价其相互对立的发现呢?我们的工作将摆脱这一僵局。它建立在两大传统之上,并试图调和其方法论上与实质上的矛盾。

第二章里,在描述并评价了两大研究传统之后,我们提出了自己的方法论意义上的研究路径。该路径一旦与第三章提出的理论观点相结合,就可以跳出前述的僵局。在接下来的三章,我们通过对复杂事实的崭新分析,检验了这些看法。基于整合在一起的理论和方法论框架,我们阐述了自己对大量案例的比较历史研究。我们认为,这将解决有关发展与民主间关系的论争。并且,既然这一论争在经验民主研究中一直占据中心位置,我们的研究就不会以解决圈内的学术争论为限,而将做得更多;它将为弄清民主的主要有利或不利条件提供新的线索。